

# 民族团结话语修辞英译行为研究

李方超

四川民族学院，四川康定，中国

**【摘要】** 修辞不仅是一种语言手段，更是一种认知方式。民族团结话语采用比喻、引用和用典等修辞，构建并塑造着我国民族事务政策话语。其英译采用直译、意译和省译等方式，不仅有效传递了原文的精神实质，也保留了原文的修辞特征。从“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看，民族团结话语的英译是制度化译者高度求真与高度务实相统一的结果，即译者既要对原文的政治意涵和修辞形式高度“求真”，又要对目标读者的认知习惯和国际传播效果高度“务实”。本文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下，系统考察民族团结话语修辞方式的英译策略与行为理据，揭示制度化译者在双重约束下的决策机制，以期为中国特色民族话语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民族团结话语；修辞英译；译者行为；“求真-务实”连续统；制度化译者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民族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校级专项资助：“习近平民族团结话语译传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海外传播研究”（XYZB2106ZX）

## 1. 引言

当今世界，全球化纵深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国际话语权竞争[1]作为国家软实力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其重要性愈发凸显。中国特色对外话语的国际传播已成为增强我国话语竞争力，构建我国国家话语权的重要维度。围绕中国特色对外话语[2]国际传播的研究层出不穷，也有大量聚焦我国民族工作事务和领域的民族团结话语[3]方面的研究，但其翻译与国际传播[4]方面的研究不多见。而民族团结话语作为我国民族事务政策体系的核心表达，承载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其对外翻译质量与国际传播效能直接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民族政策的理解与认同。

笔者研读了新时代以来我国民族工作理论、政策和文本等重要文献及其官方译本，特别是认真总结、提炼和梳理这些文本当中的民族团结话语特征与内涵。研究发现，我国民族团结话语大量运用比喻、引用、用典等修辞方式，形成了一套兼具政治严肃性与语言感染力的表述体系。从“石榴籽”的比喻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情表达，修辞策略的运用使民族团结话语获得了超越政策文本的感召力量。然而，当这些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的修辞方式进入英语世界时，译者往往陷入两难局面，既要忠实传达原文的政治内涵，又要使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获得可接受性。这一困境将我们引向一个核心议题：民族团结话语修辞英译的译者行为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其背后的行为理据又是什么？

为理据又是什么？

本文借助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5]，以民族团结话语修辞英译为例，考察制度化译者在语言转换过程中的行为轨迹，揭示高度求真与高度务实如何在制度化译者中达成统一。

##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2.1 译者行为批评与“求真-务实”连续统

梳理翻译批评[6]研究学术发展史，不难发现翻译批评研究历经了翻译的语言学批评范式，该范式主要聚焦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等值程度；再到翻译批评研究的文化范式和社会学范式[7]。这两种研究范式分别将翻译置身于跨文化交流场域和空间，以及社会环境之中。翻译质量评估[8]不再力求实现译文和原文之间所谓距离越小越好的静态、机械式评价标准。在当下，综合上述研究范式，立足本土翻译实践现实的基础之上，周领顺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综合全面可操作且具有本土性质的翻译批评理论，即译者行为批评。

译者行为批评是周领顺教授提出的翻译批评研究理论框架，其核心贡献在于将译者视为“语言人”与“社会人”的统一体，从翻译内与翻译外两个维度考察译者行为的合理性[5]。该理论走出了传统翻译研究囿于文本对比的局限，将译者的社会身份、翻译目的、赞助人要求等外部因素纳入分析视野，使翻译批评从静态的文本评价走向动态的行为阐释。

“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是译者行

为批评的核心分析工具。所谓“求真”，是指译者为实现理解原文、再现原文语言意蕴这一基本任务而展现的行为；“务实”则指译者为实现翻译在目标语社会中的实际效用而采取的行为。两者并非二元对立，而是构成一个连续统：译者的任何决策都处于“求真”与“务实”之间的某一点上，其行为合理度取决于对于“求真”与“务实”二者之间的平衡状态[5]。

## 2.2 制度化译者及其行为特征

制度化译者是指受国家机构资助、服务于国家外宣需求的译者群体，其典型特征在于译者行为受制于机构规范和政治考量。与市场化译者以读者反应和经济效益为导向不同，制度化译者的翻译活动具有明确的“国家公务员”角色定位，其翻译实践是国家翻译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9]。

任东升、朱虹宇的研究表明，制度化译者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语言表达等各环节均体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他们参照的原文蓝本往往经过严格筛选，翻译过程中政治考量优先于文学雕琢，译文风格偏向庄重规范[9]。

民族团结话语的英译主体正是典型的制度化译者，其翻译活动都服务于国家政治外宣的战略目标。这一身份特征决定了译者行为的基本走向：既要对原文的政治意涵高度负责（求真），又要确保译文的国际传播效果（务实）。

## 3. 民族团结话语的修辞方式及其话语功能

民族团结话语的修辞运用并非单纯的文字修饰，而是服务于话语建构和政治传播的深层需求。梳理我国民族事务政策文献，可以发现三类核心修辞方式：

### 3.1 比喻修辞：从认知图示到情感认同

比喻是民族团结话语中使用最广泛的修辞方式。“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已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志性表述。石榴的意象选择颇具匠心，石榴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多子多福、团结圆满，其果实是众多籽粒紧密相依、共享同一果实，这恰好隐喻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在逻辑。这一比喻将抽象的民族关系具象化，使政策话语获得直观的认知图示和强烈的情感共鸣。

类似的比喻修辞还有“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一家亲”等。采用“家庭”隐喻激活了目标受众有关亲情、温暖、责任的文化联想，将民族关系的政治表述上升为具有普遍人类情感基础的话语形式。

### 3.2 引用与用典：历史纵深与权威加持

民族团结话语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舟车所至，人力所通”等古典表述被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民族政策的话语资源。例如，“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民间比喻被用于阐释各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

引经据典的修辞功能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借助经典的文化权威为政策主张寻找权威理据；二是通过历史纵深的引入增强话语的厚重感和说服力。

### 3.3 排比与反复：节奏感与强调效果

民族团结话语中常见排比结构的运用，如“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等。排比结构通过句式的整齐划一强化语义的连贯性和节奏感，使核心信息在重复中得到凸显。这种修辞方式既符合政策文本庄重规范的文件要求，又能在受众心理上形成累积强化效应。

上述修辞方式的运用使得民族团结话语超越了政策文本的工具性功能，获得了感染人、凝聚人的话语力量。然而，这些植根于中华文化语境的修辞进入英语世界时，如何实现语言形式的转换与文化意涵的传递，成为译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 4 修辞英译的译者行为分析

笔者通过梳理新时代民族团结话语英译发现，翻译策略的选择集中体现了制度化译者在“求真”与“务实”之间的动态平衡。以下结合具体译例进行论证分析。

### 4.1 直译：高度求真的形式对应

对于文化通约性较强、直译不影响理解的修辞，译者往往采用直译策略，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修辞形式。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石榴籽”比喻的英译。“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官方英译为“all ethnic groups stick together like the seeds of a pomegranate”。这一译文采用了完全的直译：石榴(pomegranate)、籽粒(seeds)、紧紧抱在一起(stick together)等核心意象一一对应。值得注意的是，石榴在英语文化中虽不具有中国文化那样的象征意义，但其果实的结构特征具有跨文化的通约性，受众可以直观想象众多籽粒紧密相拥的画面。因此，选择直译不仅实现了语言形式的求真，也有效传递了原文的认知理据。

类似地，“中华民族大家庭”译为“the big family of the Chinese nation”，“各民族一家

亲”译为“all ethnic groups are one family”。“家庭”隐喻在英语文化中同样具有积极的情感联想，直译策略实现了形式与功能双重层面的求真。

#### 4.2 意译：务实取向的意义传达

当民族团结话语修辞方式涉及中华文化特有的典故或表达习惯时，直译可能造成受众理解障碍，此时译者倾向于采用意译策略，在保留核心意义的前提下通过调整表达形式以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例如，“亲望亲好，邻望邻好”这一民间谚语，若逐字直译为“relatives wish relatives well, neighbors wish neighbors well”，虽能传达字面意思，却难以体现谚语的精炼节奏和文化韵味。官方译文处理为“amity between relatives and neighbors is what we wish”，将谚语转化为陈述句式，核心意义得以保留，而表达形式更符合英语读者的认知习惯。这一选择体现了译者在求真（保留原文字面）与务实（确保可理解性）之间的权衡。二者不可兼得时，意义先于形式。

用典修辞的翻译同样体现了这一取向。如“和而不同”这一源自《论语》的经典表述，官方译文处理为“harmony in diversity”。这一译文舍弃了原文的否定句式（“和而不同”字面为“harmony but not sameness”），转而采用英语中常见的“diversity”与“harmony”并置的表达，与欧盟“united in diversity”的格言形成互文。译者的务实考量清晰可见，既要传达“和谐与多样性的统一”这一核心意涵，又要提升译文在英语语境中的可识别性和接受度。

#### 4.3 省译：必要性原则下的修辞取舍

在某些情况下，译者会采用省译策略，舍弃原文的修辞形式，仅保留核心信息。这一策略通常用于原文修辞功能在译文中难以实现、且修辞本身并非核心信息载体的情形。

例如，某些政策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不断加强”“深入推进”等修饰性表达，其修辞功能在于强化语势，但若逐一翻译为“constantly strengthen”“deeply advance”，可能导致译文累赘冗余。官方译文往往采用省译或简化处理，在保持核心动词语义的前提下，省略修饰成分。这一取舍体现了译者在“务实”维度上的考量，即译文需要符合英语政治话语简洁凝练的文体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省译策略的使用受到严格约束。对于承载核心政治意涵的修辞（如“石

榴籽”），省译不可接受；对于辅助性、修饰性的修辞，省译则成为提高译文可接受性的务实性选择。

#### 5. 制度化译者的行为理据：高度求真与高度务实的统一

以上译例分析表明，民族团结话语修辞英译呈现出“高度求真”与“高度务实”双重特征。这一看似矛盾的特征何以成立？研究发现，这由制度化译者特殊的身份定位和行为逻辑决定。

##### 5.1 高度求真的政治约束

制度化译者对原文的“高度求真”首先源于翻译工作的政治性。民族团结话语涉及国家民族政策的核心表述，任何偏离原文意涵的翻译都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误读甚至曲解。正如刘雪芹教授所言，民族政策术语翻译绝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关乎话语权、叙事重塑的深层战略考量[10]。

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核心概念的英译探索充分体现了这一约束。研究表明，当前该术语存在多种译法，而“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在语义对等性、文化适应性和传播有效性三个维度上均展现出优势[11]。这一译法的确立过程本身就是高度求真的体现，因为译者反复权衡“forge”所蕴含的主动建构意涵、“sense of community”对共同体意识的准确传达，从而力求在译文中完整再现原文的政治内涵。

##### 5.2 高度务实的传播考量

然而，求真并非译者的唯一追求。制度化译者同样高度关注译文在目标语社会中的传播效果，这正是“务实”维度的体现。黄勤教授的研究指出，制度化译者的行为受制于机构命令，政治考量高于文学雕琢，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沦为“翻译机器”。相反，经过外宣训练的译者会在权衡翻译内外因素时以政治因素为首要考量，而政治传播的最终效果恰恰要求译文必须具备可接受性[12]。

##### 5.3 求真-务实的动态平衡

从译者行为的动态过程看，民族团结话语修辞英译中的求真与务实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翻译准备阶段，译者首先对原文进行深度解读，准确把握修辞方式的政治意涵和文化理据。这是求真的起点。在翻译转换阶段，译者根据修辞类型的差异、目标语文化的特点、国际传播的规律，灵活选择直译、意译、省译等策略。这是务实的展开。在译文审校阶段，机

构层面的多重把关确保译文既符合政治要求的“真”，又具备传播效果的“实”。

这一动态平衡的实现，有赖于制度化译者群体的专业素养和制度保障。他们既是语言转换的专家，又是政治传播的行家。也就是，既对原文负责，又对读者负责；既追求翻译内的语言求真，又追求翻译外的社会务实。

## 6. 结语

民族团结话语修辞英译是一场在语言与文化、政治与传播之间寻求平衡的实践智慧。本文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下，考察了比喻、引用、用典等修辞方式的英译策略及其行为理据，揭示了制度化译者“高度求真”与“高度务实”相统一的决策机制。

研究发现，民族团结话语的修辞英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译者身份、文本属性、传播目标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直译策略体现了对原文修辞形式和认知理据的高度求真；意译和省译策略则反映了对目标读者认知习惯和国际传播效果的高度务实。二者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达成动态平衡，共同服务于中国特色政治话语有效传播的战略目标。

这一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为理解制度化翻译实践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案例，揭示了求真与务实如何在特定文本类型中实现统一。其实践启示在于，政治话语的对外翻译需要培养兼具语言能力和政治意识的复合型译者，需要建立既尊重原文又关照读者的翻译规范，需要在求真与务实的张力中寻求动态平衡的艺术。

## 参考文献

- [1] 檀有志. 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国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J]. 教学与研究, 2013, (04): 62-70.
- [2] 张威. 中国特色对外话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1949—2019）——思路与方法

[J]. 中国外语, 2020, 17 (05): 91-99.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20.05.012.

- [3] 王军, 刘毅. 当代中国民族团结话语的演进及其理论源流[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0 (01): 7-14. DOI:10.19898/j.cnki.42-1704/c.2020.01.003.
- [4] 张红, 李凯玥. 基于语料库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英译对外传播与接受研究[J]. 翻译研究与教学, 2023, (01): 31-37.
- [5] 周领顺. 译者行为与“求真一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译者行为研究(其一)[J]. 外语教学, 2010 (1): 93-97.
- [6] 刘云虹. 译者行为与翻译批评研究——《译者行为批评: 理论框架》评析[J]. 中国翻译, 2015, 36 (05): 65-70.
- [7] 喻锋平. 国内外翻译研究转向及范式转换综述[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2, (02): 78-81. DOI:10.13458/j.cnki.flatt.000475.
- [8] 司显柱. 论功能语言学视角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研究[J]. 外语教学, 2004, (04): 45-50. DOI:10.16362/j.cnki.cn61-1023/h.2004.04.007.
- [9] 任东升, 朱虹宇. 沙博理与葛浩文之不同：制度化译者行为视角[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 (2): 55-66.
- [10] 刘雪芹. 中国民族政策术语英译——作为政治实践的翻译[R]. 桂林旅游学院讲座, 2025-11-14.
- [11] 郭薇, 陈芯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概念英译研究[J]. 民族论坛, 2025(2): 60-68.
- [12] 黄勤. 中国文学经典外译中的译者身份与译者行为之关系研究[R].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讲座, 2021-04-14